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理解当代中国的低生育水平

——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及其变迁

李 婷

JRUCWP2025054

2025. 09. 16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
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理解当代中国的低生育水平

——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及其变迁

李 婷

[摘要] 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基于对低生育率多重解释逻辑的整合，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框架阐释了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双重特征下，低生育率成因的一般性与独特性，即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破坏了生育的支撑结构；这两者分别与新的宏观条件结合，进一步强化了生育决策联合逻辑的内在冲突；结构的动摇与技术的赋能使个体酝酿出推动生育规范变革的能动性。这也预示着下一步提振生育意愿的措施蕴含在重新建立人与人口的互嵌结构并协调生育和发展的价值取向之上。这不仅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人与人口的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统一的体现。

[关键词] 生育行为；制度逻辑框架；传统“家”文化；生存发展动机

一、引言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将人口发展与现代化国家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推动性作用，另一方面则明确人的全面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与终极目标，体现了人口问题在过程与目标上的统一性。这一特征被高度凝练在2023年5月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要求中：“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①

人口发展日趋重要的另一面，是我国人口在近些年来出现了急剧的转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在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相继实施后，2020年总和生育率仅为1.3。^②大量的文献显示，我国的婚姻和生育领域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直接影响了出生人口数量，也关乎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前景。^③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会对人口结构和社会发展带来影响，长期的少子老龄化可能带来对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生产及消费、技术创新等的冲击。^④基于此，党和政府把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

作者：李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li.ting@ruc.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家庭与可持续发展研究”（24&·ZD155）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载《求是》，2024（12）。

②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

③ 李婷、郑叶昕、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3）；於嘉、赵晓航、谢宇：《当代中国婚姻的形成与解体：趋势与国际比较》，载《人口研究》，2020（5）。

④ 童玉芬：《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及应对策略》，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3）。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凸显生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更是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支持实践进入全新的历史阶段，^① 需要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进行全面的探索和归纳，进而对实践构成呼应与支撑。

对低生育率形成机制的广泛关注，还凝聚着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理论的期待。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低生育率现象就进入人口学家的视野，逐渐从一个单纯的人口学问题演变成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的学科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来解释低生育的形成机制：人口学关注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因子；经济学着眼于成本收益以及预期假说；社会学强调宏观的文化变迁与制度的影响；而心理学则聚焦于从认知到行动的转换过程。^② 虽然多学科视野的介入促进了低生育现象研究的多元化，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关理论的碎片化，如何将其整合成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是当下低生育率研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对中国低生育率研究的第二个挑战来自如何处理理论上的一般性与独特性问题。一方面，主流研究依然把中国的生育水平变动纳入世界范围内的一般性转变进程中，广泛借鉴基于西方社会的低生育率理论模型。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中国及东亚的低生育率进程具有其独特性，并逐渐汇聚到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性问题之上：其一，中国的文化与制度特征在低生育率的形成中起到了何种作用？其二，与中国具有文化相似性的东亚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处于全球生育率倒数水平的生育“洼地”？^③

基于以上两个挑战，本研究尝试构建一个系统的解释中国当下低生育率的理论框架，它既需要整合多种理论的视角和研究层次，也需要回应中国低生育率进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并融入中国社会的演进特征。对低生育水平成因的探索不仅肩负着寻找生育问题解决方案的任务，也天然带有洞见理论的工具意义，构成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

二、低生育率现象研究和中国特色问题

（一）解释低生育率的三重逻辑

对低生育率现象的探究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众多西方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但其总和生育率并没有停留在经典人口转变理论所预测的更替水平，而是展现出继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从西欧逐渐扩散到东欧，再蔓延到东亚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构成了全球的低生育水平现象（表 1），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④ 研究者虽然试图把经典人口转变的研究范式迁移到低生育率研究之上，但普遍发生的低生育率现象具有更高的复杂性。^⑤ 其一，相比于人口转变中社会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低生育率的影响因子更加复杂，难以对其中的决定性因素进行判定。其二，相比于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过程的一致性，低生育率现象展现出显著更高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既体现在国家与国家间低生育率的进程和实际水平之间存在显著不同，更表现为生育率与影响因子的关系存在明

①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4】48 号，2024 年 10 月 19 日。

② 李建民：《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③ 陈友华、孙永健：《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④ J. Goldstein, T. Sobotka, and A. Jasilionien. "The End of "Lowest-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9, 35 (4): 663-699; 吴帆、李建民：《中国面临生育危机风险的三个信号：低生育率、低生育意愿和生育赤字》，载《山西师大学报》，2022（1）。

⑤ 邬沧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1）。

显的地域差异。^① 低生育率现象的复杂性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关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相关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表 1 东亚与世界典型国家或地区生育水平（2023）					
区域	国家或地区	总和生育率	区域	国家或地区	总和生育率
东亚	中国大陆	1.0	北欧	丹麦	1.51
	中国香港	0.72		瑞典	1.43
	中国台湾	0.87	南欧	西班牙	1.21
	日本	1.21		意大利	1.20
	韩国	0.72		希腊	1.33
	新加坡	0.94	东欧	波兰	1.30
西欧	英国	1.56		匈牙利	1.49
	法国	1.64	大洋洲	澳大利亚	1.64
	德国	1.44	南美	智利	1.17
北美	美国	1.62	经合组织（OECD）		1.48

数据来源：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4，United Nations，<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Fertility/>。

在多元的另一面是低生育率研究的庞杂与碎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不同学科之间差异化的研究视角与理论取向，已有研究采用三重视角的方式对此进行归纳。^② 从传统人口学视角出发，邦戈茨（Bongaarts）的生育模型基于总生殖力（total fecundity）考虑影响生育结果的中间变量，包括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③ 然而，随着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邦戈茨和其他学者开始关注到生育行为对意愿的偏离，提出了更具现代意义的生育模型，以生育意愿为基础，考虑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生育年龄推迟、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指对工作、收入等因素的偏好）的作用，^④ 其中生育意愿和后三个因素构成了分析当代低生育率的基本框架：生育意愿下降对应了“不想生”，生育年龄推迟和竞争性因素对应了“不敢生”，而非自愿不孕不育则对应了“不能生”。^⑤ 应该说人口学视角提供了基于行为的低生育率的第一重逻辑，展示了影响生育水平的直接因素，但这还无法完全揭示低生育率形成的底层机制。

如果把生育中间变量再往外推演，则可引申出对婚姻、教育、职业、收入、住房等变量的讨论。它们通过作用于直接因素，影响生育水平。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该层次的分析，从成本收益和理性决策的视角探讨低生育水平的成因。例如，考虑以结婚、教育、住房等为代表的直接成本和以职业发展为代表的机会成本对生育形成的竞争，^⑥ 以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对生育的推迟效应。^⑦ 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范式提供了基于决策的低生育率的第二重逻辑。

① H. Kohler, F. Billari, and J. Ortega.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2, 28 (4): 641–680; J. Goldstein, T. Sobotka, and A. Jasilionien. “The End of “Lowest—Low”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9, 35 (4): 663–699.

② 李建民：《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③ J. Bongaart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78, 4 (1): 105–132.

④ J. Bongaarts. “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1, 27: 260–281; P. Morgan. “Is Low Fertility a Twenty-first-century Demographic Crisis?” *Demography*, 2003, 40 (4): 589–603.

⑤ 李建新、盛禾：《邦戈茨生育模型演变及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新解释》，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3（3）。

⑥ T. Diprete, P. Morgan, H. Engelhardt, and H. Pacalova. “Do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sts of Children Generate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Fertility Rates?”.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3, 22: 439–477.

⑦ T. Sobotka, V. Skirbekk, and D. Philipov. “Economic Recession and Fertility in the Developed 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1, 37 (2): 267–306.

显然，婚姻、教育和职业等变量也是嵌合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中，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社会学范式更期待从物质、文化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阐释低生育率的成因。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是其中文化视角的代表，它强调个体主义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导致个体在婚姻家庭行为上的变革，包括同居逐渐替代婚姻、生育与婚姻解绑，进而造成生育意愿下降。^① 制度理论则更看重物质实践和制度变革的作用，它通常构建于生命历程之上，重点关注包括教育、家庭、工作、医疗在内的社会制度如何影响和塑造个体的生活轨迹。在这一框架下，低生育水平可以归结于诸如经济压力和就业市场的竞争等社会制度因素对个体有关家庭的决策产生作用，导致婚育推迟、生育率走低。^② 基于性别视角的一系列理论在兼顾性别观念的演化之外，强调公私领域的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作为影响生育水平的关键变量。^③ 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与劳动参与率的上升，打破了原有公私领域分离的社会结构以及性别化的社会分工。在公领域，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经济功能，但在以家庭为代表的私领域，既有的性别规范与制度的固化，使得女性面临更严峻的工作与家庭冲突，从而降低了女性的婚育意愿。^④ 除此之外，消费主义兴起、技术变革等因素也被认为会对低生育率的形成产生作用。^⑤ 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学范式的研究存在物质、文化和制度视角的分化，但它们都致力于提供基于结构的低生育率的第三重逻辑。

这三重逻辑的聚合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下学界对低生育率生成机制的基本认知，形成了从行为到决策再到结构的解释路径。然而，也是因为学科之间的区隔，这些逻辑并没有得到系统地整合。一个研究议题的理论发展通常会经历从单一到多元的分化过程。以低生育率研究为例，早期的人口转变理论设定了生育率下降的初步理论框架，但随着对问题探索的深入与多学科的介入，低生育率研究的理论取向不断丰富，更多的研究开始聚焦于特定的机制，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但是当分化进展到一定程度时，又可能产生整合的需求。对低生育率研究来说，这一需求既来自于学术，也来自于实践。

从学术脉络来看，当下越发精细的单个理论在解释全球低生育率时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仅体现在同一变量与生育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或者人群分化，例如，房价对生育的影响在国内外方向不同，工作对生育的影响也存在资源效应和竞争效应的分歧；^⑥ 更体现在曾经广泛使用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出现下降。比如，随着近些年来北欧国家生育率的持续走低，^⑦ 单一的性别平等理论已经很难阐释其低生育率的形成逻辑。突破现有研究困境的路径，可能蕴含在对理论的整合

① R. Lesthaeghe.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 Concise Overview of Its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 (51): 18112–18115.

② M. Kohli.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Looking Back to Look Ahead". *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7, 4 (3–4): 253–271.

③ F. Goldscheider, E. Bernhardt and T. Lappegård. "The Gender Revolution: 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anging Family and Demographic Behavi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5, 41 (2): 207–239.

④ P. McDonald. "Gender Equity in Theories of Fertility Tran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0, 26 (3): 427–439.

⑤ P. Morgan and M. Taylor. "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6, 32 (1): 375–380.

⑥ 李子联：《收入与生育：中国生育率变动的解释》，载《经济学动态》，2016（5）；何明帅、于森：《家庭人均收入、代际社会流动与生育意愿》，载《劳动经济研究》，2017（5）；G. Anderson. "The Impact of Labour-Force Participation on Childbearing Behaviour: Pro-Cyclical Fertility in Sweden during the 1980s and the 1990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00, 16 (4): 293–333；H. Liu, L. Liu, and F. Wang. "Housing Wealth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23, 36: 359–395.

⑦ S. Ohlsson-Wijk and G. Anderson. "Disentangling the Swedish Fertility Decline of the 2010s". *Stockholm Research Reports in Demography*, 2022, 1: 1–16；L. DeRose and L. Stone. "More Work, Fewer Babies: What Does Workism Have to Do with Falling Fert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2021, 1–35.

之中。将不同理论取向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将有助于形成具有纵深和解释力的知识体系。在低生育率研究中,理论整合的关键是识别三重逻辑之间的衔接和传导路径,即对结构如何实现对决策的塑造,决策如何转化成个体行动并产生分化进行机制刻画。这在本质上折射了结构与能动性对立的经典问题,提供了理解中国社会变迁重要理论问题的线索。

从实践要求来看,在先后经历生育数量放开、生育支持政策的分散试点后,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为标志,我国将进入生育支持政策全面实施的新阶段。相比之前,这一阶段更加强调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实效性。为了与实践相呼应,理论也必然需要走向整合,为厘清不同政策机制之间的关联,锚定政策的定位与功能意涵,建立具有协同性的支持体系提供理论支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天然勾连起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与自下而上的能动性视角。这两者的理论嵌合也为政策体系的构建提供逻辑基础。

(二) 中国低生育率的一般性和独特性问题

构建当下中国低生育率的整合性解释框架还需要回应中国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毋庸置疑,在中国生育水平快速下降阶段,即总和生育率从5以上下降到更替水平的过程中,既存在一般性也蕴含特殊性。一般性体现在经典的生育转变理论被广泛引入来解释中国生育水平的下降。无论是工业化进程中劳动生产方式的变化改变了生养子女的效用以及财富流的方向,还是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对文化观念的影响,促成了在认知上对少子化观念的认同和对生育质量的追求,都符合人口转变理论中社会经济与文化变迁的普遍性影响机制。^① 特殊性则体现在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代表的制度因素在我国生育水平下降中的作用。研究普遍认可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生育率下降的内生动力,政策与制度则起到了加速的作用。这两种力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影响力,共同构成了我国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②

相对而言,对于当下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否存在特殊性的问题却没有那么清晰的答案。一方面,中国当下的极低生育水平无疑也是世界低生育水平现象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文所讨论的普遍性机制的影响,具有一般性。^③ 另一方面,如果进一步审视数据就会发现,世界范围内的生育水平存在相当程度的地区性差异。如表1所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具有显著更低的生育水平,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均在1.3的极低水平之下,位于全球倒数,构成名副其实的生育“洼地”。在共同的极低生育率的背后,东亚社会还有着高度相似的文化与社会演进特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推进或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这意味着,中国当下的极低生育水平蕴含着传统文化与社会情境的独特性。

对于传统在中国生育水平走低中的作用,早期的研究倾向于将其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对立面:现代化发挥着拉低生育水平的作用,而传统文化所秉持的“传宗接代”与“多子多福”等观念则起到了延缓生育水平下降的效果。^④ 与“经典现代化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类似,以该理论视角来理解生育变迁必然也面临线性发展观以及二元对立模式的局限。在实践中,东亚社会的生育“洼地”现象预示着中国的传统与文化并没有发挥预想的阻碍作用,反而进一步促成了生育率的走低。在理论上,越来越多针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开始寻求传统与现代的新的结合方式,相继提出“传统与

① D. Kirk.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Population Studies*, 1996, 50 (3): 361-387.

② 陈卫:《“发展—计划生育—生育率”的动态关系:中国省级数据再考察》,载《人口研究》,2005(1);郑真真:《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从亚洲看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3)。

③ 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8);郑真真:《生育转变的多重推动力:从亚洲看中国》,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3);於嘉、谢宇:《中国的第二次人口转变》,载《人口研究》,2019(5)。

④ 朱国宏:《生育文化论》,载《复旦学报》,1992(3)。

现代的博弈”“马赛克家庭主义”以及“个体家庭”等概念来阐释两者在中国情境下的复杂关系。^①然而这些研究在解释中国当下极低的生育水平时依然存在不足。一方面，这些着眼于家庭的理论，缺乏对生育现象的专门解释。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缺乏在中观和微观层面的机制统合，因而无法在生育问题上实现对传统与现代或者说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深层次整合。这两者的统一不仅是构建中国本土化理论的需求，也是嵌入中国情境、提炼中国方案的政策实践需要。

三、基于制度逻辑框架的中国生育基本运作逻辑

（一）生育基本运作逻辑的三层系统框架

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无论是跨学科理论视角的融合，还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都可将对结构与能动性的整合作为突破口。中国的独特性根植于文化和制度的结构之中，但其效用发挥必须通过个体开展决策和行动的能动性加以实现。因而，既需要描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的宏观结构，又需要刻画出从结构到能动性的互动机制。与此同时，将结构和能动性整合的意义还体现在将作为行动者的“人”带回到作为整体的“人口”之中。长久以来社会人口学所秉持的宏观研究取向，不同程度地忽略了个体行动的价值和意义，遮蔽了人口与人的发展在手段和目标上的统一性，从而影响生育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社会学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进展为整合结构与能动性提供了启示。吉登斯经典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以及休厄尔（Sewell）随后的拓展对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做出了基础性的阐释：结构不仅可以影响和塑造社会行为，也能通过社会互动不断进化和发展，个体的能动性是其中的关键。一方面行动者通过结构中处理信息的认知框架——图式来进行指引，调动和使用结构中隶属物质层面的资源。另一方面，资源的获取又使得行动者能够进一步习得图式，在复制结构的过程中被赋予改变图式、重塑资源的可能性，从而推动新结构的形成。^②

与吉登斯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制度理论也开始向新制度主义转向。相比于前者，后者更加注重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制度的非正式性和动态演化，并在其中引入认知逻辑与能动性的微观过程。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帕特里夏·H. 索顿（Patricia H. Thornton）提出的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框架更细致描绘了个体能动性发挥作用的层次和机制。它特别强调结构具有多个嵌套层次，既包括底层的基于文化与物质实践特征的支撑系统，又涵盖指引认知和决策的图式系统。这种图式系统可能来自多个子系统逻辑的联合，行动者可以依据联合逻辑采用多元策略，发挥能动性，构成个体行动的微观系统。^③这几个嵌套层次的设定很好契合了解释低生育率的三重逻辑，由社会基本规则界定的支撑系统对应于结构逻辑，指引认知的决策系统对应于决策逻辑，而行动系统则对应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框架的引入，将有利于三重逻辑的整合以及中国特征的嵌入。

脱胎于制度逻辑框架，生育的社会基本运作逻辑也应该至少涵盖支撑、决策和行动三个系统。

①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王震宇、唐灿，《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载《社会学研究》，2011（2）；计迎春：《“马赛克家庭主义”——从女儿养老看中国家庭制度变迁》，载《二十一世纪》，2020（4）；沈奕斐：《个体家庭 iFamily：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与国家》，279-291页，上海三联书店，2013。

②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89-98页、378-379页、408-4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W. Sewell,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1）：1-29.

③ P. Thornton and W. Ocasio,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Royston Greenwood, Christine Oliver, Kerstin Sahlin, and Roy Suddab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AGE Publishing, 2008, pp. 99-129.

它们互相关联相互作用，支撑结构塑造了决策系统，决策系统指引了个体行使能动性的方式，而能动性的汇集不仅导向了群体层面的生育结果也蕴含着推动规范和结构改变的可能性。需要理解的是，生育的基本运作逻辑应该体现出一个社会的底层运行准则，它们通常由个体基本的行动伦理汇聚而成，成为具备稳定特征的“恒常”，维持社会的运转。费孝通深刻阐释了传统中国社会如何围绕生育形成婚姻、家庭等社会制度，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结构的稳定。^①然而《生育制度》所采用的视角相对静止，并不利于理解当下低生育率如何形成。相对而言，制度逻辑则赋予了结构可变性，在研究动态变化的过程时具有潜在的优势。

图1展示了基于制度逻辑的中国社会生育基本运作逻辑及其变迁，下文将对该示意图依次展开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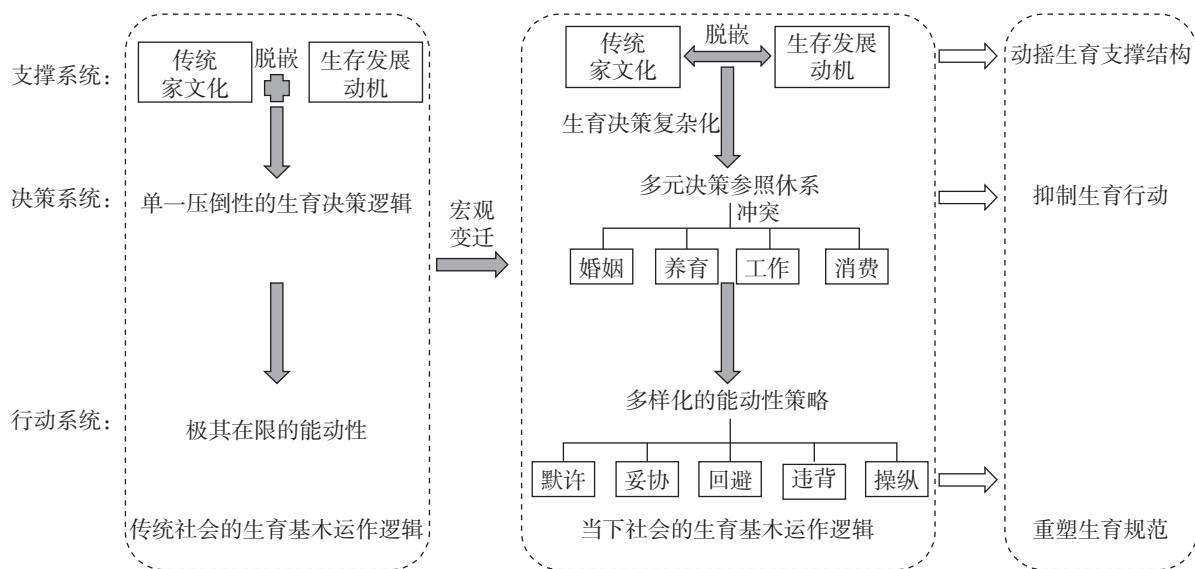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社会生育的基本运作逻辑及其变迁示意图

（二）变迁的起点：中国传统社会的生育基本运作逻辑

传统中国社会生育模式的支撑性结构建立在一系列的社会法则和底蕴之上，其中最突出的两个要素是传统“家”文化和以生存发展为导向的原生性动机。前者锚定了基本的社会结构，后者成为个体行使能动性的动力机制。

传统“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与表现形式，但其核心建立在“家本位”思想之上，围绕家族至上的观念展现出以下几个特征：强调家庭的和谐、团结与凝聚力，强调个人利益对家庭利益的服从，强调家庭成员对家庭负有的责任。^②基于家庭繁荣绵延的需求，这些特征在代际关系上演化出向下的“责任伦理”，使得个体对家庭成员特别是子代的责任和义务成为其行动的指引。正如周飞舟所强调的“一本一体”意识，中国人把自己看作连接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之间的一个环节。这种纵向的关系取向意识，孕育出中国人强烈的责任感，构建起个体基本的行动伦理。^③除了代际，与“家本位”思想紧密关联的关系取向也以“差序格局”的方式深刻影响中国人，产生出集体主义、“面子”文化等行动逻辑。^④

① 费孝通：《生育制度》，45-62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②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载《社会》，2015（1）。

③ 周飞舟：《一本与一体：中国社会理论的基础》，载《社会》，2021（4）。

④ 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6（5）。

如果说传统“家”文化是一种社会性的结构，那么生存发展动机则天然具有很强的生物属性，常常以实用主义的面貌出现。^①但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种生物属性逐渐与经济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等外部条件结合，呈现出社会性的一面。例如，儒家认可人应该追求生存和繁荣，但重要的是手段要符合道德；道家强调顺应自然，认为生存发展需要与自然相协调；而传统“家”文化更是与生存发展动机呈现出极强的互嵌效应。一方面，在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以及匮乏的社会保障体系下，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社会结构为个人生存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机会空间与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个人的发展又在传统“家”文化指引下与家庭繁荣和传承的目标紧密关联，使得个人与家庭的生存发展动机二合为一、不可分割，构成了“生生不息”的生存论意蕴。^②文化与动机的互嵌，促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稳定，作为连接个体责任与家庭传承关键的生育行为也就具备自我稳定的支撑结构。这种支撑结构的存在又进一步塑造了传统社会的生育决策体系，使其内化成为一种文化规范，即个体并不需要过多调用认知资源进行生育决策，只需遵循“多子多福”这一主流的生育规范。^③同时，互嵌结构的稳定性也使得偶尔偏离的生育行为很容易被纠错，因而个体很难通过能动性从内部推动生育规范的变革。

至此可以对中国传统社会生育运作逻辑的三个特征进行总结：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互嵌所构成的支撑结构、单一且压倒性的生育决策逻辑，以及极其有限能动性下个体稳定的行动模式。

四、中国社会生育基本运作逻辑的变迁：脱嵌、冲突与重塑

（一）宏观变迁的冲击：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

如果说传统生育模式的背后是以“家本位”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互嵌，那么宏观社会变迁对生育的冲击，可以概括成三个机制：其一，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就此打破了生育模式的自稳定体系。其二，这两者各自与新的宏观条件结合演化，生成并塑造了复杂的生育决策系统。其三，以技术变革为代表的宏观变迁赋予个体推动生育规范改变的可能性。这一小节将主要围绕第一点论述。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国经历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其中叠加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巨大跃迁，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融入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与市场流通，飞速的技术变革等一系列复杂交织的宏观进程。其中，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全球化、新技术革命等在全世界广泛发生，是当下世界范围内生育转变的共同基础，但中国社会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些宏观进程与社会基本运作逻辑的结合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就生育转变而言，宏观变迁最突出机制是使得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的动机产生分离。具体来说，这一过程通过以下的路径实现。

首先，生产方式和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使得个体的生产、工作和消费等经济活动逐步从家庭中分离。家庭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掌控，个体不再依赖于家庭从事生产活动，就业场所与家庭剥离，导向了工作与家庭情境的隔离。个体的收入更多与其劳动投入和生产要素关联，不经由家庭直接分配给个人，因而有更大的自由度来安排消费与支出。全球化导向的生产模式又大幅度提高了人口流动的普遍性，家庭成员间的空间距离被显著拉大，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共享性进一步下降。

其次，制度环境的转变强化了以个体为单元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方面是国家在制度上的松绑，个体从原来的家庭和集体分配中脱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个人欲望的正当性逐渐被社会承认。国

① 杨善华、孙飞宇：《“社会底蕴”：田野经验与思考》，载《社会》，2015（1）。

② 孙向晨：《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反思》，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③ 吕静、吕红平：《我国生育观念演变及新时代转型发展研究》，载《人口与社会》，2024（6）。

家开始鼓励自由流动与自主就业,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能动性创造性被激发,促进了经济领域的自主化实践。城市的积分落户、教育政策以及住房等制度均以个人为实施单位,客观上鼓励了通过个体化的竞争来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资源。^①与此同时,国家也放松了对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管控,离婚的自由度显著提升。2011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和加强了家庭中财产的个人属性。^②国家退出日常生活领域也给予了围绕个人展开的消费主义在中国蔓延的空间。^③另一方面,国家积极推动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截至2021年我国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覆盖率已超过90%,较高比例的城镇老年人可以依靠养老金维持基本生活。^④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进一步减弱了个体对家庭在生存上的依赖。

再次,社会支持体系的形成增强了个体独立生存的能力。在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的供给之外,全球化下商品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也为个体的独立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除了衣食住行这些传统家庭功能的社会化与服务化,资本与商品的供应也蔓延至精神与情感领域。休闲娱乐产品的丰富以及宠物与陪伴类经济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个体对家庭生活的需求。借助城市的现代支撑体系,独自生活的现象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⑤

最后,新观念的交流与融合冲击了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能动性互嵌的价值基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生育观念。而全球化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变革更是极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激发了各类文化元素的借鉴和交流。在某种意义上,也为个体提供了指导和阐释日常行动的多元文化工具箱。以崇尚个体成就为核心价值观的西方个体主义观念的涌入,动摇了个体发展与家庭发展的同一性。需要指出的是,新观念的入侵并不一定是对传统观念的替代,更有可能的是与传统观念选择性结合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以代际关系为例,“家”文化与强调精神和自我感受的后物质主义的思潮结合,演化出责任与情感的双重伦理。在传统责任的基础上,以情感的强弱来指导、协调和正当化代际内部的互动,在事实上更加强化了家庭内部亲子之间的纽带,形成了新型的“家”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深远影响。

以上种种宏观变迁对生育基本运作逻辑的冲击最终体现在传统“家”文化及其所构建的社会次序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个体与家庭发展目标的同一性被打破,生存发展的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被窄化为个人的事业成就与财富积累。当然,这种脱嵌并未导向西方语境下的个体主义,而是更多体现在生活机会的个人化。脱嵌也并不意味着使得传统消亡,而是强调维持传统生育运作逻辑的稳定支撑结构的解体。生存发展动机的个人化与财富成就导向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的创造力和创造力,但其带来的流动性与不稳定性与传统“家”文化所主导的稳定的家庭和生育模式发生背离,从而酝酿出结构变革的可能。

就决策系统而言,个体与家庭发展目标同一性的下降也意味着生育决策趋向于复杂化。除了家庭延续的基本需求外,个体开始面临诸多并行的目标,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生育决策。社会的现代化为个体赋予更大的选择自由的同时,也带来更加复杂的选择空间。因此,理解为个体生育行动提供参照和意义建构的决策体系,是进一步解释低生育水平现象的关键。

① 钟晓慧:《个体化理论下的中国家庭研究:转向与启示》,载《中国研究》,2020(1)。

② D. S. Davis. “Privatization of Marriage in Post-socialist China”. *Modern China*, 2014, 40 (6): 551-577.

③ 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④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系列新闻发布会:我国10.3亿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全民医保基本实现》,见人民网,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2/0920/c14739-32530151.html>.

⑤ 克里南伯格:《单身社会》,5-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

（二）多元生育决策体系的形成以及联合逻辑的冲突

制度逻辑视角提供了一个重要设定，帮助勾勒出个体日益复杂的生育决策体系，即影响行动者决策的社会系统通常由多个子系统或制度空间构成。^① 这些系统中的主导逻辑为行动者在某一生活领域中进行意义建构提供了参照系。决策系统可对应于上文提到的第二重解释逻辑，但相比于经济学研究通常聚焦于单个决策要素，制度逻辑更强调决策的理性并不是建立在单一同质的逻辑之上，能动性发挥的情境是由各类相互竞争的逻辑所塑造的，这些逻辑会相互交织，但也可能会存在冲突。设定这种交织的逻辑体系可以很好捕捉到个体在考虑生育时所面临的多重目标的复杂现实，与传统社会单一压倒性的生育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为了考察与生育关联的子系统，本研究从微博、知乎、抖音和哔哩哔哩四大社交媒体中通过关键词检索收集了 55874 条有关生育困境的评论，通过机器学习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在提及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时，网络评论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共计超过 90%）：婚姻困境、养育负担、工作与生存焦虑，以及经济与消费压力。这意味着个体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在认知上还至少调动了四个不同的社会子系统：婚姻、养育、工作以及物质消费。这几个维度既可映射到邦戈茨模型的生育推迟和竞争性因素，也呼应了近些年来主流文献对生育影响因子的探讨。例如，已有研究将低生育率的微观因素归纳为婚姻家庭观念转变、收入与消费观念的变化、养育教育成本上升、就业风险以及家庭—工作冲突等。^②

表 2 基于生育舆情数据分析获得的生育困境分类

类别	典型表述	占比
婚姻困境	“讨不到老婆”“恋爱都不想谈”“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都挺难”	8.36%
养育负担	“哪有时间照顾”“没精力培养”“养孩太卷”“教育成本太高”	19.33%
工作与生存焦虑	“生存压力大”“没法平衡工作与家庭”“我选择事业前途”“对女性就业尤其不友好”“现在年轻人太难了”	39.85%
经济消费压力	“没钱”“买不起房”“降低生活品质”	22.51%
合计	90.05%	

这些子系统的特征可以从生育底层运作逻辑的“家”文化和发展动机两条线索来理解，它们分别与制度特征和社会变迁等宏观因素产生交互，对子系统的逻辑进行塑造。

就婚姻系统而言，中国传统上是一个“普婚”的国家，“人人都要结婚”是最核心的逻辑，这也是“家”文化所构建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婚姻之所以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参照系统，是因为在当下中国婚姻与生育之间依然存在极强的关联。超低的婚外生育率展现出文化要素对婚姻家庭模式持续性的影响，^③ 不仅仅是未婚生育或者单身母亲可能受到的“污名化”，事关家庭的“面子”，更是中国父母在责任和情感双重伦理的规范下对子代高度责任感的体现。与此同时，生存发展动机与西方个体主义的结合推动了青年婚姻价值基础的变化。调查显示，青年开始强调婚姻基于个体意义上的价值：情感陪伴与互助进步，^④ 即婚姻需要围绕个体需求而存在，助力个体发展，成为实现个体价值的一种资源，促成了“个体式婚姻”模式的形成，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婚姻匹配难度。^⑤

① W. Sewell.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98 (1): 1-29.

② P. Morgan and M. Taylor. “Low Fertil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6, 32: 375-380; 翟振武、李姝婧：《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济南大学学报》2023 年第 1 期。

③ 宋健、郑航：《非婚生育走向何处——比较视野下的婚育模式变迁》，载《探索与争鸣》，2023（9）。

④ 李婷、郑叶昕、闫誉腾：《中国的婚姻和生育去制度化了吗？——基于中国大学生婚育观调查的发现与讨论》，载《妇女研究论丛》，2022（3）。

⑤ A. J. Cherlin.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Marriag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4, 66 (4): 848-861.

养育系统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来自当下养育和教育的高负担。^① 父母对子女在养育与教育资源上的巨大投入,一方面体现了责任伦理的延续。当养老保障不再成为养育子女的第一考量时,对子女成长和发展的责任和义务是驱使父母开展养育行为的主要动机。另一方面,在以个体职业和财富成就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下,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承载着父母对于子女达成其生存发展目标的希望。这既源于传统科举制度“唯才是举”的深远影响,也来自现代西方教育体系确立的绩效主义原则对教育水平和个人能力的看重。^② 然而父母对养育教育的重视进一步演变成养育教育的“军备竞赛”,则离不开全球化竞争环境所导致的就业市场和回报的不确定性。父母试图通过参与教育竞争来应对不确定性问题。这进一步拉长了竞争的战线,加剧了教育的“内卷”和养育的负担。责任伦理和个体化的生存发展动机不断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下的绩效主义、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教育竞争等因素相结合,使得个体选择生育需要跨越的责任心理门槛被大幅度提高,塑造了“负责任但高成本”的养育逻辑。

工作对当代青年而言不仅是实现婚育和生存发展的必要手段,也逐渐成为一种价值体系和社会的主要秩序。这既源于传统文化对于“勤劳致富”的推崇,也来自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所催生的现代工作伦理,鼓励个体进入就业市场,强调工作是获得生存发展和人生意义的手段,主张个体应该通过工作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认可。^③ 这样的伦理受到中国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多样化生活机会的激发,与绩效主义原则进一步结合,^④ 在客观上强化了生存发展动机的个人化及其评价标准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无论是社会转型、还是全球化抑或信息时代的技术变革都增加了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就业不稳定的预期进一步激发了工作的竞争性。在叠加了中国就业体制内部极强的年龄晋升规范与组织在管理和控制方式上的变革后,^⑤ 工作的高强度、高时长与不确定性也成为当下职场的显著特征。

物质消费对青年生育决策的影响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观察。从供给端来看,社会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商品供给的极大丰富,创造了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基于商品经济的城市支持系统,挤占了青年对婚育的需求。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推进,社会逐渐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并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促成了消费主义在中国的发展。^⑥ 在现代媒体的包装下,高品质的生活被塑造成了理想生活的样板。财富和消费行为成为个体表达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最主要的方式之一。^⑦ 这一倾向与个体化的生存发展需求以及“面子”文化不谋而合,进一步加深了个体对消费的信仰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这在一方面促使青年对工作的投入,另一方面也重塑了婚姻和家庭生活的物质标准。物质基础越发成为婚姻匹配和生育决策中的先决条件,为子女提供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也成为责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的物质基础中,住房又成为其中的焦点,因其兼具“刚需”与符号消费的属性。^⑧

这些社会子系统共同构建起用以锚定个体生育决策的参照体系,但由于不同子系统的逻辑存在矛盾,它们交织形成的联合逻辑就可能会孕育出潜在的冲突。生育联合逻辑的冲突显现在:婚姻仍然是生育子女的前提,但婚姻匹配难度上升;工作的高竞争性和不稳定性,提高了婚姻的门槛以及

① 李建民:《中国的生育革命》,载《人口研究》2009(1)。

② 陶涛:《教育焦虑传导机制下的低生育意愿及应对》,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23(3)。

③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12—35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④ 张品、林晓珊:《陪伴的魔咒:城市青年父母的家庭生活、工作压力与育儿焦虑》,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4)。

⑤ 赵炜、Jens Thoemmes:《谁改变了工作时间——有关工时的劳动社会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4)。

⑥ 王宁:《“国家让渡论”:有关中国消费主义成因的新命题》,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⑦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36—4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

⑧ 葛玉好、张雪梅:《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载《人口研究》,2019(1)。

获得足够生育物质基础的难度；婚姻匹配难度的增加与婚姻进入成本的上升使得青年的初婚年龄不断推迟，甚至引发终身不婚水平的升高；在婚育紧密关联的文化下，这也导致初育年龄的相应推迟、生育期的压缩、不孕风险的增加以及可能的终身不育水平的上升；“负责任的养育”大大提高了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时间成本，对父母工作发展既产生了需求又带来了冲突；对就业市场竞争和不稳定性的感知促使父母加大对子女养育教育的投入，进而对工作产生了更强的需求和冲突。

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动摇了生育的支撑结构，个体在缺少传统“家”文化所提供的依恃状况下，面对着由多种宏观因素结合所塑造的生育决策体系。这一决策体系内联合逻辑的冲突，对生育行动产生了抑制。虽然不同学科的研究分别考察了养育成本、教育、就业、工作—家庭平衡等维度对生育的影响，但四个子系统所代表的多种逻辑的联合，是生育行为决策的总体背景。进一步，这种整合性的理论视角在运用于实际研究时，可避免因为遗漏不同子系统的交互作用，出现片面和矛盾的结果。

（三）行动者的应对策略及其异质性

制度逻辑视角最大的特征是强调个体具备开展决策和行动的能动性，但它非常依赖于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分层秩序或者角色体系，由此导致他们在能动性的体现方式和程度方面存在系统性的差异。^①因此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个体会采用不同的策略去实现自身目标或者进行意义建构。奥利维尔（Oliver）将行动者的行动策略由消极到积极维度划分为默许、妥协、回避、违抗以及操纵这五种具体方式，^②可以很好对应日常中观察到的不同的生育实践行为。

首先是“默许”，意味着行动者默许联合逻辑的冲突，尽力同时达成婚姻、生育、子女培养、个体发展和物质生活等多重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推迟了行动者进入婚姻和生育的时间，也非常可能需要动用整个家庭的支持和照料资源来调和矛盾。采用第二类“妥协”策略的行动者会放弃达成多重目标，转为降低对物质的要求或对个体发展的预期以实现理想的生育数量；采用第三类“回避”策略的行动者，会对生育持无计划的低欲望态度。这种低欲望并不是行动者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而是受到冲突逻辑压制后，无法达到预期的生育目标。采用第四类“违抗”策略的行动者，会选择主动降低生育预期以实现其他的系统目标，表现出低生育意愿。而那些采取“操纵”策略的行动者，不仅持有低生育意愿，还试图突破生育文化规范，对低生育意愿甚至不育行为进行合理化建构并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宣扬。这些策略集合也导向了现实中观察到的生育现象：初育年龄不断推迟，实际生育数量远低于理想子女数，以及社会上蔓延开来的低生育情绪。

需要理解，采用不同策略的行动者并不是在人群中均匀分布的。依据社会位置的不同以及所属身份角色的区分，行动者对逻辑冲突的感知程度与动用行动资源的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别、工作、收入以及托育服务供给等都可以成为典型的“分化器”，由此可以解释这些变量与生育在微观层面的复杂关联，也使得该框架能够阐释具有不同特征的群体之间的生育异质性。

（四）个体能动性对生育规范重塑的可能性

行动者的能动性除了导向不同的行动策略外，还具备推动制度转型的可能。此种能动性通常需要通过沟通和交谈的过程发挥作用，有赖于个体之间的联系和配合。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是关键。^③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正成为提升行动者能动性的关键性技术，因为其改变了信

① P. Thornton and W. Ocasio. “Institutional Logics”. in Royston Greenwood, Christine Oliver, Kerstin Sahlin, and Roy Suddaby ed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SAGE Publishing, 2008, pp. 99–129.

② C. Oliver.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1, 16 (1): 145–179.

③ 渠敬东：《制度过程中的信息机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

息的传播和流动方式。

与传统媒体信息传递的相对集中和单向不同,社交媒体赋予了行动者“可读可写”的能力,将他们变成了网络上一个个彼此发生互动关系的节点,能够表达、结识和影响网络中的其他人。^① 信息传递的去中心化让行动者有机会获得海量多元的信息。这使得一方面,普通行动者能更实时“监控”他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生活与成就,高竞争和高焦虑的情绪得以更广泛传播,他人的行为和人生选择也变得更加难以被忽视。行动者通过镜像与自我监测不断更新对成功与幸福生活等目标的定义。^② 另一方面,行动者个人的行为和观点,通过网络节点的传播无限延伸,有了产生更大范围影响的可能。^③ 因此,在社交媒体时代,大范围连接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得到极大增强,社会容易快速形成新的叙事,影响系统逻辑,加速社会变迁。

那些对婚育问题采用“操纵”策略的行动者,虽然在人群中占比很低,但他们更有可能通过社交媒体来宣扬其非传统的婚育观念与实践。相对而言,这些激进的言论也更有可能会获得关注与传播。根据沉默螺旋理论,当此类行动者越积极表明观点时,秉持传统观念的一方就会倾向于沉默。于是,最终可能出现非传统婚育观念的声音越来越大,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的螺旋式过程。^④ 这些社交媒体上的活动构成了个体能动性在婚育议题上的重要呈现方式,使得少数人也具备推动了生育规范转变的可能,促成了生育运作系统的演化。

五、中国独特性的延伸：解释东亚社会的低生育现象

在探讨中国独特性时,本文曾引出东亚社会的生育“洼地”现象,这是因为一来中国的低生育率特征只有置于全球比较的视野中才能得以更好显现,二来东亚社会相似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也是独特性的重要指针。那么作为独特性的延伸,基于中国社会的生育基本运作逻辑也可以为东亚社会的生育“洼地”现象提供解释,而这一解释又可进一步为生育框架的有效性提供佐证。

表3展示了东亚主要国家或地区与OECD国家的婚育及其决策系统的代表性指标。如果从邦戈茨模型来看,相比于OECD国家,东亚社会的突出特征首先体现在初育年龄的普遍推迟。生育推迟将会对生育率施加进度效应,即便保持同等的队列生育水平,观察到的时期生育率也会被压低。^⑤ 虽然当下中国的初育年龄相对较低,但也正在经历快速推迟,这意味着进度效应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在增加。生育率下降的第二个因素是生育意愿的走低。东亚各国普遍显示出低于更替水平的意愿子女数。第三个因素是非自愿不孕不育,除去生理性不孕因素外,东亚社会超低的婚外生育率和不断推迟的结婚年龄在客观上增加了非自愿的不孕不育。

表3 东亚国家或地区生育及其决策系统的特征

国家或地区	女性平均初育年龄 ^a (岁, 2020)	女性意愿子女数 ^b (个, 2021—2023)	婚外生育比例 ^c (%, 2017—2020)	年均工作时间 ^d (小时, 2019)	15岁学生周学习时长 ^e (小时, 2015)	典型城市房价收入 ^f (2020)
中国	27.9	1.64	7.3	2 169	57.1	41.5(上海)
中国香港	32.3	1.47	8.1	2 148	46.4	47.5

① C. Fuchs. “Web 2.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1, 8 (3): 288–309.

② M. Lövheim, A. Jansson, S. Paasonen, and J. Sumiala. “Social Media: Implications for Everyday Life, Politics and Human Agency”. *Approaching Religion*, 2013, 3 (2): 26–37.

③ 王天夫:《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12)。

④ E. Noelle-Neumann. “The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oncept of the Spiral of Silence”.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1, 14 (1): 256–287.

⑤ 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载《人口研究》,2008(4)。

续前表

国家或地区	女性平均初育年龄 ^a (岁, 2020)	女性意愿子女数 ^b (个, 2021—2023)	婚外生育比例 ^c (% , 2017—2020)	年均工作时间 ^d (小时, 2019)	15岁学生周学习时长 ^e (小时, 2015)	典型城市房价收入 ^f (2020)
中国台湾	31.1	1.2	3.9	2 085	48.2	33.1 (台北)
日本	30.7	1.93	2.4	1 691	41.1	14.0 (东京)
韩国	32.3	1.55	2.5	1 980	50.5	24.0 (首尔)
新加坡	31.1	1.9	2.1	2 330	50.8	22.3
OECD	29.4		41.9	1 709	44.5	10.8 (纽约)

数据来源：a. OECD数据库。

b. 中国：2021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①；日本：2021生育调查 https://www.ipss.go.jp/ps-doukou/e/doukou16/Nfs16R_summary_eng.pdf (未婚与已婚的加权)；韩国：2021年全国家庭和生育率调查 <https://www.kihasa.re.kr/en/publish/paper/research/view?seq=46915>；中国香港：2021香港计划生育知识、态度及实践统计调查 [https://www.famplan.org.hk/files/media/press-release/2023/Press@20230815v2%20\(final\).pdf](https://www.famplan.org.hk/files/media/press-release/2023/Press@20230815v2%20(final).pdf)；新加坡、中国台湾：2022—2023生育调查^②。

c. 日本、韩国、新加坡和OECD同a；中国：基于CFPS所计算的80后婚外生育比例；中国香港（2018）：https://www.socialindicators.org.hk/en/indicators/family_solidarity/27.4；中国台湾（2020）：<https://www.ris.gov.tw/app/portal/346>。

d. 世界工作时间数据库 <https://ourworldindata.org/working-hours>。

e. 2015年全球学生评测项目调查数据 <https://www.oecd.org/pisa/data/> 汇总计算。

f. 世界居住成本数据库 <https://www.numbeo.com/property-investment/rankings.jsp>。

这些基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阐释了东亚超低生育率的第一重逻辑，但要进一步探讨低生育率的深层机制，还需借助本研究所构建的框架，解释意愿走低和婚育推迟背后的原因。从底层的支撑系统来看，东亚社会普遍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衍生出类似的家庭和集体主义传统，在国家引领的制度转型中快速推进现代化，并促成了家庭传统与个体发展动机的分离。图2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显示，东亚主要国家或地区对于家庭重要性的评价在过去三十年间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随年份的推进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上升，说明“家”文化在这些地区中并没有完全衰落。在加速的转型过程中，面对日常生活的剧烈变化，东亚的个体创造性地调用了传统家庭与现代各类文化元素，塑造起了相似的生育决策系统。如表3所示，大部分东亚国家或地区相比于同等发展水平的OECD国家有显著更长的年均工作时长，更多的学生周学习时间以及更高的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再加上极低的婚外生育比例，分别对应了四个生育决策子系统的主要特征：高强度的就业市场、沉重的养育和教育负担、以住房为代表的巨大消费压力以及婚育之间紧密的关联。已有不少研究单独展示其中单一特征与生育率的关系，^③但本文更进一步指出东亚社会普遍兼顾的多元特征的联合会酝酿出更加尖锐的逻辑冲突。

从决策的冲突到低生育率还需要通过个体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转化为行动结果。在现实中可以从生育行动的结果对上文提到的几类应对策略进行回溯。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表4展示了2012年24—35岁（处于生育旺盛期）尚未生育或未达到理想子女数的中国青年在8年时间内的生育结果类型。46.4%的青年在2020年达到了初始的理想子女数，另外有5.5%的青年超过了生育预期。大约47.6%的青年没有实现生育理想。这些未实现生育理想的青年中又有2/3的人在2020年降低了生育预期。理想子女数为0并坚持未生育的青年仅占0.2%。那些达到生育预期的青年大多采用了默许或妥协的策略；未实现生育理想且未改变目标的青年更有可能采取回避的策略；

① 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载《人口与健康》，2022（8）。

② A. Cheung, L. Lui, and Z. Mu. “Political Efficac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s: A Survey Experiment Stud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Singapor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24, 120: 103014.

③ J. Liu, C. Xing, and Q. Zhang. “House Price, Fertility Rates and Reproductive Inten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2: 101496; T. Anderson and H. Kohler. “Education Fever and the East Asian Fertility Puzzle: A Case Study of 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13, 9 (2): 196 - 215; M. C. Brinton and E. Oh. “Babies, Work, or Both? Highly Educated Women’s Employment and Fertility in 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9, 125 (1): 105 -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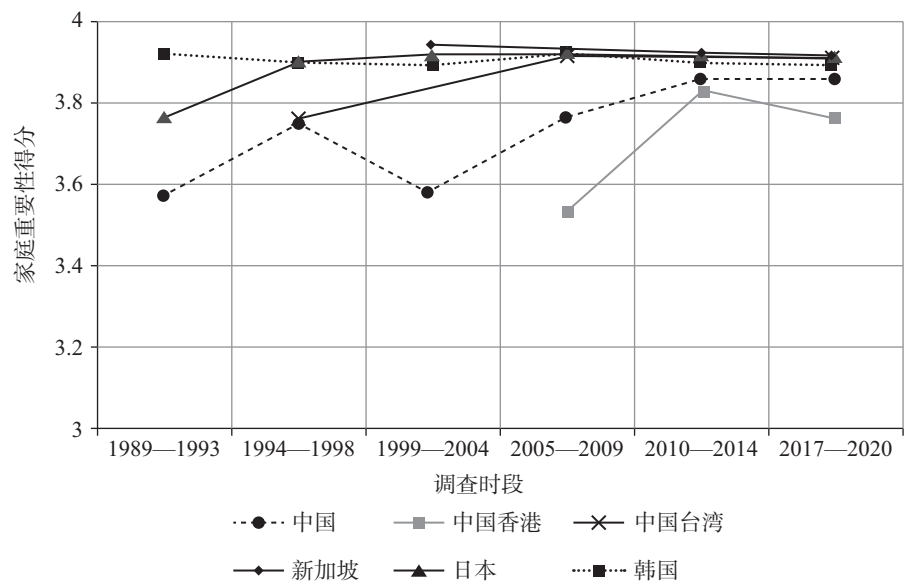


图 2 东亚国家或地区家庭重要性得分随时期的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价值观调查 <https://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家庭重要性得分来自个体对家庭重要性的打分，从很重要、重要、不太重要到很不重要，依次赋值 1-4。

而降低生育理想或者坚定不生育的青年则可能采用了违抗和操纵的策略。这一结果也可以作为队列生育实现率的近似估计，仅有约 52% 的个体达成或超过生育目标。以理想子女数为 2 来计算，这个实现率很好模拟了当下接近于 1 的实际生育水平。这也说明实际生育率的下降更多来自生育的推迟或者生育理想被压制。

表 4 24—35 岁中国青年 2012—2020 生育结果类型分布 (%)

		实现生育理想	未实现生育理想 ^a		生育超预期	坚定未生育	生育理想不确定
			未改变生育理想	降低生育理想			
总体 (n=1801)		46.42	15.82	31.76	5.66	0.22	0.11
性别	男 (n=926)	46.76	20.41	26.35	6.16	0.22	0.11
	女 (n=875)	46.06	10.97	37.49	5.14	0.23	0.11

数据来源：根据 CFPS2012、2014、2018、2020 年数据测算
a. 因 2012 年未测量理想子女数，只通过该年数据筛选出尚未生育或未实现生育理想的个体。将 2014 年所测量的理想子女数作为初始生育理想；将 2020 年再次测量的已生育和生育计划情况与 2014 年进行比对

理论框架中行动策略的异质性视角强调行动者因其所属的身份角色的区分，对冲突的感知程度和资源的调用能力存在差异，导向了不同的策略。以性别为例，男性作为婚育物质成本的主要承担者，感受到更大的物质成本与工作竞争带来的压力，因而更可能采用默许或者回避的策略。相对而言，女性则面临个体发展需求与性别角色定位之间更大的矛盾，要么采用妥协的策略降低个体工作预期，要么采用违抗与操纵的策略，主动选择少育乃至宣扬非常规的婚育实践。这也是现实中女性生育意愿更低，但内部分化也更大的原因。从表 4 的追踪结果来看，女性主动降低生育理想的比例显著超过男性，指向在生育策略上女性有更高的违抗倾向。东亚社会受“家”文化的影响，普遍具有更加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因而综合两性意愿的生育水平被进一步拉低。

六、余论：生育水平如何提振

在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① 本研究借鉴制度逻辑框架,相对简洁地刻画了中国生育的基本运作逻辑及其变迁,揭示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低生育率成因。它是独特文化情境与社会演进特征下生育基本逻辑变迁的结果,即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的脱嵌动摇了生育的支撑结构;内化的责任伦理和个体化的发展需求与制度环境等宏观条件结合,强化了生育决策联合逻辑的内在冲突;结构的松动与技术的赋能使个体酝酿出推动生育规范变革的能动性。这一框架并不与已有的研究背离,而是试图将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解释逻辑进行整合,统合中国低生育率现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调和结构和能动性在其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映射了社会变迁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命题。

对中国低生育率现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探讨,蕴含了如何看待现代与传统的经典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下极低生育水平是传统与现代糅合下的产物,但从多个层次的逻辑制度框架来看,两者的互动方式具有更加复杂的面向。对于支撑系统来说,现代化并没有简单实现对传统的替代,只是改变了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方式,例如,使“家”传统与个人发展动机分离。在中观的决策层面,宏观变迁大幅度扩展了个体行动面对的竞争性选项。而在微观的能动性层面,现代化的推进赋予了个体更大的行动和选择能力。个体在创造性地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以应对快速社会变迁与制度约束下生存发展需要的时候,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生育决策系统,加剧了竞争性选项之间的逻辑冲突,影响了选项之间的排序偏好。因此,传统在此轮生育率走低的过程中扮演着协同者的角色,并通过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实现与现代元素的协作。

对中国低生育率现象结构与能动性的思考,也触及了个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根本命题,即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与作为集合概念的人口之间的张力与和谐。人口过程是由无数个体的微观实践汇集而成,但个体的长远福祉又取决于人口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整体效能。因此,人的发展与人口的发展应该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传统社会生育的互嵌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两者的统一,这在本质上也是生存逻辑在群体与个体层面的统一。然而,现代社会的剧变在赋予了个体更大的行动能力的同时,也不断提升了个体生存这一逻辑的优先级。如果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这也是社会持续加速和不断被强化的增长逻辑的一部分,在客观上导致了这两种逻辑的冲突。家文化所蕴含的“生生不息”的群体性生存逻辑与个体化和优绩主义驱动下的个体性生存逻辑之间的不相容,使得个体的理性导向了群体的非理性,人的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超低生育率现象正是这种内在紧张的外化表现。

对低生育率机制的讨论,最终需要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体系的构建之上。在中国的生育支持实践试图摆脱碎片化、分散化与片面化的当下,低生育率框架提供了政策整合与协同的理论基础。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生育决策空间是多元和交织的,单一片面的政策难以撬动关联系统的运作。政策之间也必须是协同的,因为破解生育难题的关键在于缓解矛盾,这就要求政策本身具有内在一致性,围绕人的多元发展需求展开,不能扩大甚至制造新冲突。例如,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不能影响个体的收入预期,生育成本分担机制不能对个体就业带来负面效应,而减缓养育焦虑不应以牺牲教育发展前景为代价。

低生育率框架还有助于理解生育支持政策的定位及其在国家治理秩序中的意涵和功能。传统西

^① 根据 2017 年全国生育意愿调查、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以及 2021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结果,我国 15—49 岁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从 1.76 下降到 1.73,再到 1.67。参见李婷:《当代青年生育观的多重向度》,载《人民论坛》,2023 (15);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谱写新时代人口工作新篇章》,载《人口与健康》,2022 (8)。

方的生育支持更多被定位为福利保护型政策，由此也常陷于“福利陷阱”的争论，^①但从本文所揭示的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来看，在提供福利保障之外，生育支持更应该立足于发展。这不仅要求将生育支持的目标锚定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之上，更是需要将其定位于发展型政策，以支持和满足个人在工作、家庭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发展型需求为目标。这意味着，提振生育率不是生育支持政策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首要目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积极的就业政策、社会投资政策相辅相成，是“以发展谋福祉”的中国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以主要矛盾带动全局工作的政策治理方针的延续。^②

低生育率框架也指引了中国特色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底层逻辑，即建立新的互嵌结构。无论是时间、经济、服务类支持，还是文化、制度建设，都需要着眼于重构生育的支撑结构。传统生育观念能够在小农经济时代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其通过传统“家”文化与生存发展动机产生勾连。当这种连结断裂之后，传统生育观念已经缺乏生存的土壤。新的互嵌结构要建立在全新的相互契合的生育和发展观念之上。一方面，需要对生育赋予更契合现代思潮与个体发展需要的价值体系，例如，情感体验、包容性以及对个人成长的意义感等。另一方面，也需要给生存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国家需要从教育、职业等领域改革入手，倡导并为青年提供多样化的成长发展路径，同时承认甚至奖励个体对家庭发展的付出，彰显出个体在家庭发展过程中所能获得的价值和认可。将生育的价值观与发展的价值观重新协调，在本质上也是重建人与人口在过程与目标上的统一结构，呼应习近平总书记“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的论述。^③与西方建立在资本化与物化基础上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追求人的发展和人的美好生活为目标，彰显人的主体地位。^④因此，积极应对青年的生育困境、助力人的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破除社会进程中的弊端、走出独特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

Understanding Low Fert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Basic Operational Logic of Fertility and Its Evolution in China

LI Ting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ntinuously delayed childbearing age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intentions, this study integrates multiple explanatory frameworks for low fertility rates. It illustrates both the universality and uniqueness of China's low fertility phenomenon through the dual lenses of 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social evolution. Specifically, the disembedding of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from survival-development motivations has undermined the structural support for fertility. These factors, interacting with new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intensify inherent conflicts within the joint-decision logic of fertility. The destabilization of structural foundations and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have cultivated individual agency that drives normative changes in fertility behavior. This framework foreshadows that future measures to boost fertility should focus on reconstruc-

① 陈友华、苗国：《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载《江海学刊》，2023（6）。

② 房莉杰、潘桐：《以发展谋福祉：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4）。

③ 习近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载《求是》，2024（22）。

④ 赵义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特征》，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3）。

ting the embed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s while reconciling value orientations between fertility and development. Such an approach not only aligns with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for high-quality population development but also epitomizes the unity of means and ends in advancing human-centered population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ertility behavior; Institutional logic framework;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Survival-development motivation